

## 文化

## 误解与交锋

## —— 别尔嘉耶夫与伊里因关于以强力抗恶问题的争论

张桂娜

【内容提要】1925年6月，俄罗斯政治哲学家伊万·伊里因在德国首都柏林发表《以强力抗恶》一书，引起俄侨民界知识分子的激烈争论，其中以别尔嘉耶夫和伊里因的理论交锋最具理论深度。这场争论发生在“哲学船事件”之后，在一定程度上是那批热爱祖国却又不得不离开的知识分子在离开后对其命运的首次讨论，讨论的主题是俄罗斯应当如何走出革命和如何进行国家政权建设这一问题。这场争论折射出了俄罗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两种矛盾倾向，即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知识分子的无政府主义追求。在俄罗斯新的社会发展道路的最终形成中，政治家借鉴了知识分子对祖国命运的思考，有意匡正了俄罗斯政治史上的这两种矛盾倾向的弊病，从而在政权建设上选择了一个适合俄罗斯具体情况的中间化立场。

【关键词】以强力抗恶 十月革命 国家权力的限度

【中图分类号】G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1094(2012)03-0078-0006

1922年秋发生了俄罗斯历史上著名的“哲学船事件”，苏俄陆续将大批知识分子驱逐出境。然而，这批乘坐“哲学船”被迫离开祖国的知识分子虽然走上了相同的流亡之路，但他们在思想上并不是志同道合的。到达欧洲之后，他们立即陷入冲突与争论中，其中最重要的一次争论是围绕伊万·伊里因的《以强力抗恶》一书展开的，司徒卢威、吉皮乌斯、津科夫斯基、别尔嘉耶夫、弗兰克等俄侨民界知识分子多数都参与其中。为什么这本书会在俄侨民界激起这么大的波澜？本文深入追索著名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和伊里因在该问题上争论的焦点，管窥

俄罗斯侨民界对这一问题关注的原因，并从一个特定的视角展现苏流亡知识分子早期的思想状况。

## 一、两位哲学家迥异的生命历程

青年时代的别尔嘉耶夫曾是一个激进的社会活动家，他积极参加革命运动，并因此被开除了学籍，甚至遭遇流放。在流放过程中，由于受到宗教哲学的影响和生活体验的丰富，他逐渐退出社会运动舞台，沉入到了书斋生活中，从一个社会活动家变成了一个理论探索者。

【作者简介】张桂娜，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站博士后。

伊里因则经历了一个与别尔嘉耶夫相反的思想转变过程。伊里因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1906年,在导师诺夫戈罗采夫教授的推荐下,进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开始硕士阶段的学习。后来,在海得堡、弗莱堡、柏林等地游学,听过众多西方著名哲学家的课,并撰写了硕士学位论文《黑格尔哲学——作为论上帝与人的具体性的学说》。1918年夏天,他就此篇论文进行了答辩,由于这篇论文十分精彩,答辩委员会决定,不仅授予其硕士学位,还一并授予其博士学位。此间,伊里因的《法律意识的实质》、《关于国家与法的学说》、《俄罗斯法学的基本任务》等都是关于法哲学和西方哲学的理论研究著作,虽然也潜在地包含着一些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但是,哲学家进行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停留在理论层面上。可以说,至此,伊里因完全是一个未对现实问题给予过多关注的理论研究者。

然而,十月革命胜利后,伊里因走出了书斋,开始在学生和群众中发表演说,俨然成了一个社会活动家。1922年他被苏俄政府驱逐出境,同年10月来到德国柏林,由于纳粹政权的迫害,1938年7月潜走瑞士,直到1954年逝世前他一直生活在苏黎世近郊措理孔。走出书斋后,伊里因的关注点也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他开始思考俄罗斯的命运,所谈论的也主要是关于十月革命、俄罗斯民族的历史传统、俄罗斯的理念、俄罗斯的精神复兴、民主制和极权主义等方面的现实问题。对于伊里因的思想转变,俄罗斯学者索赫里亚科夫曾评价:“为了理解伊里因的创作遗产,还必须考虑到思想家的命运这个层面。如果说侨居前,书斋里的研究学者形象更符合伊里因,那么,被驱逐到国外后,他则积极地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其政论作品生动地回应着与俄罗斯和侨民界状况相关的事件。伊里因有着非常强烈的民族情感与爱国主义情感,因此,在侨居时期,其作品的重要主题是:分析将俄罗斯引向革命的原因,分析当代文明的共同危机,以及考察俄罗斯走出苦难状况的出路和俄罗斯精神复兴的道路。”<sup>①</sup>

处在同一个动荡的年代中,别尔嘉耶夫与伊里因作出了不同的选择,前者从社会活动舞台上撤回书斋,沉浸在精神创造的世界中;后者则走出书斋,开始积极地参与社会活动,他们两人关于以强力抗恶问题的争论就是在他们思想发生转向背景下逐步

展开的。

在《自我认识:思想自传》一书中,别尔嘉耶夫对自己流亡初期的生活有过这样一段记述:“我刚刚抵达柏林,一些流亡者就和某些所谓的白色运动的侨民代表进行会晤。……在我的住宅里与白色侨民的会见完全以激烈的抨击而告结束。我非常生气,甚至大声地喊叫,以至于房东出来把警察叫来了。我对通过武装干涉而推翻布尔什维主义的做法完全持否定的态度。我不相信白色运动,也不喜欢它。”<sup>②</sup>别尔嘉耶夫描述的这次会议是以司徒卢威为首的俄侨民界右派代表发起的,被驱逐的知识分子刚到侨民界,司徒卢威等人就立即与他们接洽,试图争取他们对“白色运动”的支持。在这次会议上,伊里因发表了激情四溢的演说,从道德层面高度赞扬“白色运动”,认为应当使用有效的对抗措施与新生政权斗争到底,这给司徒卢威以极大的鼓舞,但却让别尔嘉耶夫无法接受。别尔嘉耶夫激烈抨击右派对待新生政权的态度,反对用暴力手段对抗革命。实际上,这次会议是别尔嘉耶夫与伊里因关于以强力抗恶问题争论的序幕。

伊里因与别尔嘉耶夫在以强力抗恶问题上的真正交锋发生在1926年。伊里因认为,俄罗斯知识分子软弱的精神结构是造成俄罗斯崩溃的重要原因,1925年6月他发表了《以强力抗恶》一书,目的在于反思知识分子在十月革命过程中应当承担的责任,塑造知识分子积极向上的精神意志。这本书的发表就像一颗重磅炸弹在原本就不平静的俄侨民界炸开,俄侨民界的左派、右派还有宗教哲学派别的知识分子都参与到了对这本书的讨论中,其中赞同并高度评价伊里因的有司徒卢威、洛斯基,而吉皮乌斯、弗兰克、别尔嘉耶夫、津科夫斯基以及民主派人士杰米托夫等人则对之持批判态度。别尔嘉耶夫的批判文章《恶的善所引起的梦魇》发表在1926年第4期的《道路》杂志上,该文立刻被一些教会人士用作批判伊里因的权威证据,得到广泛的引证。同年10月,伊里因则发表《别尔嘉耶夫的梦魇——必须要做的自卫》一文对别尔嘉耶夫的批判进行回应。

<sup>①</sup> Сохряков Ю.И. Русская цивилизация: философия и литература. Институт рус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2010. С.480.

<sup>②</sup> [俄]别尔嘉耶夫:《自我认识:思想自传》,雷永生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0页。

在俄侨民界这场关于以强力抗恶问题的大争论中，别尔嘉耶夫与伊里因之间的交锋最具有理论深度和代表性，他们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如何对待十月革命和国家权力的限度这两个问题上。

## 二、在十月革命问题上的争论

1922年被驱逐出境的知识分子都对祖国怀有执著的爱，并且还有着复兴俄罗斯的梦想，他们不愿意离开祖国，但他们受到了新生政权的驱逐，并且在有生之年绝对没有机会再回到那里。对他们来说，造就新生政权的十月革命成了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重大精神事件，在他们的灵魂中掀起了巨大的思想风暴，因此，应当如何对待十月革命成了他们需要思考的尖锐问题。以强力抗恶的问题之所以在俄侨民界引起如此广泛的反响，是因为该问题就是俄罗斯知识分子应当如何对待十月革命问题的延续。

对于十月革命，别尔嘉耶夫和伊里因都持反对态度，认为十月革命是需要予以抵抗的恶，它给俄罗斯民族带来了极其惨痛的灾难，但是，这个恶的源头何在以及应当如何战胜这个恶，他们的观点却不尽相同。

伊里因认为，十月革命的源头在于俄国政治体制本身所固有的缺陷。历史上的君主专制政权没有将人民纳入政治生活，而是使他们完全成为消极的被统治者和受压迫者，这不仅歪曲了政治的积极本质，也破坏了人民的法律意识，从根本上腐蚀了政治统治的思想基础和经济基础，最终导致了革命的爆发和俄罗斯帝国的崩溃。在伊里因看来，革命是那些被排挤到政治领域之外、经济上受压迫的底层民众为获得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而采取的极端行动。对于底层民众的这种要求，应当予以尊重，但是，对于他们的暴力活动，则要予以坚决打击。因此，伊里因主张使用有组织的武装力量去制止革命者的暴动，但是，在暴动平息后，需要克服政治体制本身所固有的弊病，重新组织国家政权，将广大人民一同纳入到国家生活当中，培育民众的精神水平、法律意识、自治能力，使新组织的国家政权可以实现国家的理念。可以看出，伊里因是从政治体制的角度来思考十月革命的源头的，他主张通过政治的方式去对抗革命。

与伊里因不同，别尔嘉耶夫将十月革命看做内在的精神事件，他在这方面发表过大量的文章，后来还为此写过一本专著，即《俄罗斯共产主义的起源及其意义》。在别尔嘉耶夫看来，十月革命虽然以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为旗号，但它是一场地地道道的俄式革命<sup>①</sup>，它是由俄罗斯民族自身的心理结构、精神文化、政治传统等因素共同造成的，它的每一个特点都可以在俄罗斯历史深层中找到。旧时代的知识分子与统治者都是革命的肇始者，革命不是由外在的原因造成的，恰恰是历史内部各种腐败因素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面对革命，每个阶层都不能以审判者自居，不能用外在的武力去对抗新生的政权，而应当通过精神的、内在的方式去反省自己的罪恶，只有每个阶层都在精神上认识到自己的罪恶，并且以精神的方式去战胜它时，革命才能从根本上被遏止。别尔嘉耶夫是从民族精神的角度思考十月革命的起源的，同时，他认为，革命只能通过精神的方式由俄罗斯人民自己去战胜，外在的武装干涉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它。

由于对十月革命的起源及其克服方法有不同的理解，别尔嘉耶夫对伊里因针对十月革命所提出的以强力抗恶的主张也不予赞同。他认为，俄罗斯的知识分子素有崇尚暴力的传统，比如别林斯基；俄罗斯的民众也有诉诸暴力的习惯，比如普加乔夫和拉辛，这些是导致崇尚暴力的布尔什维主义产生的精神根源。而且，20世纪初又是一个血腥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很少有人质疑暴力的合法性问题，而是毫无顾忌地使用暴力去杀死思想和政治上的对手。因此，无论如何，非暴力的思想在俄罗斯传播得不是过于广泛，而是太过缺乏，在这种情况下，伊里因提倡以强力抗恶显得非常不合时宜。伊里因对这个观点的提出本身恰恰就是受革命暴力思想精神污染的结果，这不仅不能战胜革命，还会加重时代的暴力与血腥氛围。对此，别尔嘉耶夫说道：“这本书是我们时代的病态产物。伊里因中了布尔什维克之毒……他内在地接受了血腥的可怕之物，没有在自己身上找到对抗它的精神力量。”<sup>②</sup>

对于别尔嘉耶夫的批判，伊里因予以反驳。他

<sup>①</sup> Бердяев Н.А. Истоки и смысл русского коммунизма. М. ЗАО«Сварог и К»,1992.С.344.

<sup>②</sup> Бердяев Н.А. Кошмар злого добра. [http://krotov.info/library/02\\_b/berdyayev/1926\\_312.htm](http://krotov.info/library/02_b/berdyayev/1926_312.htm).



认为，别尔嘉耶夫将他描述成一个提倡暴力的理论家，这是对他的误解，事实上，他不是要提倡暴力，而只是认为外在的强制措施在必要的时候可以保护善与精神，使之免受恶的侵害；在自己的著作中，他没有论证外在强制手段的绝对必要性，并不认为在有能力使用外在强制手段的所有情况下都可以使用外在的强制手段，而仅仅是说在内在精神手段无效而外在的邪恶行为又侵害着善与精神时，才可以采用外在的强制手段用以制止邪恶的外在行为，而且，邪恶的外在行为一旦停止，就要立即放弃外在的强制手段，继续从内在的精神方面去战胜邪恶。

### 三、在国家问题上的争论

别尔嘉耶夫是一个二元论者，在他看来，存在着两个世界，即精神世界和自然世界。精神世界是充满自由精神的理想世界，而自然世界则是受必然性支配的现实处境。这两个世界有着不同的生存方式与生存规则，也应由不同的机构来管理。别尔嘉耶夫认为，精神世界的特征是自由与恩赐，其事务应由充满爱与救赎精神的教会负责，而自然世界的特征则是必然性，其事务应由拥有强制手段的国家负责。教会与国家各有自己的权限和范围，教会不得跨出精神世界，用精神的方式去处理属于国家的事务，而国家也不得越界，用强制的手段去干涉人类在精神世界中的创造活动。别尔嘉耶夫说：“毫无疑问，没有国家政权，人类社会不能存在，国家政权是限制和消除邪恶意志表现的力量，但是，不应当将罪恶世界中的这种必然职能赋予教会的意义。就职业来说，警察是有益的和必要的，但是，不应当将他与绝对精神紧密联系起来。恺撒的东西应当归恺撒，而不是上帝。”<sup>①</sup>

在国家问题上，别尔嘉耶夫持有限论的立场，认为国家有自己存在的价值，但其权力却是应当受到限制的。从这一立场出发，他认为伊里因对国家政权的定位过高，他说：“将国家与教会混淆，将相对的东西绝对化，这是伊里因的主要错误。”<sup>②</sup>在别尔嘉耶夫看来，伊里因将国家看成了绝对精神和绝对善的代表，用国家取代了教会，使国家承担起了与恶斗争的宗教使命，并使其获得了干预人类精神创造活动的合法性，这种观点是人类历史上一切专制与暴政的理论根源。

对于别尔嘉耶夫在这个问题上的批判，伊里因同样认为是由别尔嘉耶夫对他的误解造成的。与别尔嘉耶夫相同，伊里因也认为，无论是高估还是贬低国家的意义都是错误的，他的《以强力抗恶》一书并非是要将国家政权绝对化，使国家成为一种不受限制的权力，而仅仅只是针对托尔斯泰的无政府主义在俄罗斯所造成的灾难后果突出强调了国家政权的合法性，然而，他并没有否定为国家权力设置限度的必要性，他说：“否定国家的事业是荒谬的、有害的和虚伪的，而过高地评价国家的事业也是不被允许的、危险的和致命性的。就我个人观点来说，国家的事业这个词不是绝对的，也是不符合道义的，但是始终是必要的、重要的、有力量的事业。我的书就专门研究这个力量的必要性和界限。”<sup>③</sup>

### 四、对别尔嘉耶夫与伊里因之争的评价及其当代意义

伊里因将别尔嘉耶夫对其的批判归因于别尔嘉耶夫的误解，有一定的道理。事实上，伊里因和别尔嘉耶夫在如何对待十月革命和国家的问题上不是对立的，而有内在相通之处。

首先，虽然别尔嘉耶夫主张用内在的精神方式去克服革命的源头，但他并没有像托尔斯泰那样完全否定使用外在强制手段的可能性。比如，在希特勒进攻苏联时，他曾这样描述自己的心情：“德国人侵入俄罗斯土地深深地震动了我。我的俄罗斯遭到死亡的威胁，她可能被肢解和被奴役。……我在任何时候都不崇尚暴力。但是，当暴力表现为红军保卫俄罗斯时，我认为是符合天意的。”<sup>④</sup>在祖国遭受威胁时，他完全同意国民使用外在的强制措施维护祖国的安全，这就是说，虽然从内在的精神层面上才能真正认识到恶的源头，只有通过内在的精神方式才能真正战胜恶，但是，在必要的情况下，外在的强制手段是保护需要保护的对象的有効手段，它在这个时候享有充分的合法性。这实质上与伊里因关于抗恶手段的认识是一致的。在伊里因看来，对抗恶的手段有两种：即内在的精神手段和外

① Бердяев Н.А. Кошмар злого добра.

② Там же.

③ Ильин И.А. Кошмар Н.А. Бердяева. [http://anthropology.rchgi.spb.ru/pdf/64\\_Ilyin3.pdf](http://anthropology.rchgi.spb.ru/pdf/64_Ilyin3.pdf).

④ [俄]别尔嘉耶夫：《自我认识：思想自传》，第304页。

在的强制手段，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内在的精神手段都是首要的抗恶手段，外在的强制手段只是辅助性的、为主要精神手段服务的手段。

其次，虽然伊里因论证了国家的合法性，但是，他并不是国家至上主义者。关于教会与国家的关系，他与别尔嘉耶夫的看法也基本相同，他认为：“教会不应当支配国家，国家也不应当变成教会，或者将其融于自身之中；相反，教会需要独立于国家，而国家应当为上帝的尘世事业服务，但却是通过完全不同于教会的形式。”<sup>①</sup>伊里因同样将教会与国家进行了分界，并始终把国家看做保障人们实现自身精神本性的共同体，国家会保护精神，但却不会干预人们在精神领域的创造，在国家问题上，伊里因与别尔嘉耶夫一样，同样认为国家有存在的必要性，但其权力并不是无限的。普京在2005年的国情咨文中谈到国家政权的建设问题时曾说：“国家政权有自己的界限……灵魂和精神一切创造状态都以爱、自由、善的意志为前提，它们不应遭到国家政权的支配，也不能受制于它的命令……国家不能要求公民去信仰、祈祷、爱、行善、具有信念。它不能干预科学、宗教和艺术创造……它不应当闯入道德、家庭和日常生活，没有极端的必要，也不应当束缚人们的经济首创性和经济创造。”<sup>②</sup>而这段话正是出自于伊里因的《未来俄罗斯的主要任务》一文。

在十月革命和国家的问题上，伊里因与别尔嘉耶夫的观点并没有实质性的分歧，然而，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他们却围绕着这两个问题进行了一场严肃的理论争论。虽然说这场争论部分是由别尔嘉耶夫对伊里因的误解造成的，但是，如果仅仅将这场争论理解为一场误会，也低估了它的历史意义。这场争论发生在“哲学船事件”之后，在一定程度上是那批热爱祖国却又不得不离开故土的知识分子在离开后对祖国命运的首次讨论，讨论的主题就是俄罗斯应当如何走出革命和如何进行国家政权建设这一问题。在苏联解体20年之后，再次反观知识分子在20世纪初对俄罗斯命运的这一思考可以获得一些启示。

别尔嘉耶夫和伊里因都对俄罗斯怀有深沉的爱，伊里因在晚年总结自己的生命历程时，认为自己一生“只为俄罗斯而活着”<sup>③</sup>；别尔嘉耶夫也一样，俄罗斯的命运一直都是其进行精神思考的内在

主题。关于俄罗斯在20世纪前期所遭遇的“社会灾难”，伊里因归因于知识分子的无政府主义情结，他为俄罗斯开出的药方是赋予外在的强制手段和国家政权以合法性，此即他提出以强力抗恶的缘起；而别尔嘉耶夫则将革命的起源归因为知识分子的暴力崇拜和俄罗斯的专制主义政治传统，他为俄罗斯开出药方则是加强内在的精神思考，从精神层面上克服知识分子的暴力倾向，并从理论层面上为国家政权设定一个限度，此即其批判伊里因的立场。

在此，不能简单地来判断别尔嘉耶夫与伊里因谁对谁错，因为无论是无政府主义还是专制主义都是俄罗斯政治史上的突出现象。一方面，俄罗斯具有培植无政府主义的天然土壤，俄罗斯知识分子都有着强烈的宗教渴望，向往彼岸的真理正义王国，认为此岸世界不过是临时的栖居地，并不赋予国家政权过多的积极意义，甚至完全否定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几乎所有的俄罗斯知识分子都是无政府主义者，伊里因对俄罗斯之疾的诊断不能说没有针对性。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国家至上主义在俄罗斯也是根深蒂固，俄罗斯的统治者非常相信国家政权的力量，他们在决定有所作为之前，首先要做的是加强自己手中的政治权力，凭借着不受限制的政治权力自上而下地推行新的经济文化政策，一次次地将俄罗斯社会的自然发展过程强行改道，伊凡四世的统治和彼得一世的改革，甚至斯大林的现代化发展方案都是这样进行的。从这个层面上来看，别尔嘉耶夫对俄罗斯专制主义的批判也不是空穴来风。别尔嘉耶夫与伊里因的这场争论折射出了俄罗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两种矛盾倾向，即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知识分子的无政府主义追求，别尔嘉耶夫曾详细阐释过这两种矛盾倾向<sup>④</sup>，它们都对社会的发展极为不利，并都造成过极大的历史灾难。

苏联解体后，流亡海外的这批知识分子的作品强势返回本土，其中别尔嘉耶夫成为最受俄罗斯人喜欢的哲学家，而引用伊里因的作品则成了俄罗斯政治家们的时尚，伊里因甚至被视为普京的精神导

① Иван Ильин, Основы Христиан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2004, С.298.

② Ильин И.А.Основная задача грядущей России. О Воспитани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элиты. Москва.2001.С.24.

③ Ильин И.А.Что нам делать\ О Русском Национализме. Москва. 2006г. С.11.

④ [俄]尼·亚·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雷永生、邱守娟译，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3页。

师。与此同时，俄罗斯经历了一个曲折的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过程，如今，以普京为代表的俄罗斯政治家们打造了强大的国家政权，使之作为俄罗斯复兴的有效工具，又注意限制国家权力的过度膨胀，使国家不能过分地干预经济领域和精神文化创造，这实际上既尊重了俄罗斯专制主义的政治传统，又考虑到了俄罗斯知识分子向往自由的无政府主义情绪。可以看出，在俄罗斯新的社会发展道路的最终形成中，政治家借鉴了知识分子对祖国命运的这一思考，有意匡正了俄罗斯政治史上的这两种矛盾倾向的弊病，从而在政权建设上选择了一个适合俄罗

斯具体情况的中间化立场。在20世纪，中国与俄罗斯在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上，曾经表现出极大的相似性，因此，俄罗斯知识分子在20世纪初对俄罗斯命运的思考不仅能够为我们理解当代俄罗斯社会发展道路的方向提供一定的启示，而且也应当能够为我们国家的政权建设提供些许有益的借鉴。然而，在积极地从中获得借鉴的同时，我们还应该批判地对待俄罗斯知识分子出于自身立场对十月革命所持的过激态度，十月革命作为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历史上的首次胜利，其价值和意义当是不容置疑的。（责任编辑 刘阳）

## Misunderstanding and Confrontation

### — Controversy over Strong Resistance to Evil between Berdiaev and Irithin

ZHANG Guina

**Abstract:** In June 1925, a Russian philosopher Evan Irithin published his book *Strong resistance to Evil* in Berlin the capital of Germany, which brought about violent controversy among the intellectuals in the Russian expatriate community, of which the theoretical confrontation between Berdiaev and Irithin had theoretical depth most. This controversy occurred after the “philosophy ship event”, and to a certain degree, it was a discussion for the first time about the fate of the intellectual who loved their motherland but had to leave it. The topical subject of the discussion was how Russia moved to revolution and went to carry out state regime construction. The controversy reflected two kinds of contradictory tendencies in the course of Russian social development, i.e. a political system of despotism and an anarchism pursuit of Russian intellectuals. In the process of final formation of a new social development road of Russia, Russian politicians used for reference the intellectuals’ deep thinking about the fate of their motherland and had a mind to correct the malpractice of the two contradictory tendencies in Russian political history, thereby choosing a middle ground in regime construction.

**Key words:** with strong resistance to evil; October Revolution; limitation of state power